

多卷本学术通史的典范

——评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李振宏

瞿林东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第一部通史。^①这部著述出自众人之手,却富有学术个性,是一部具有个人专著性质特色的多卷本学术通史。

一、“总序”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每卷由瞿林东的一个或两个学生合作撰写,且大多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这样形成的多卷本通史,具有瞿林东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风格。瞿林东学术的理论色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学术研究所达到的理论深度和思想深度;二是重视学科研究中的宏观性、理论性问题;三是善于对所从事的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全书各卷都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瞿林东为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总序”,置于各卷之首。这篇“总序”表达了作者对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提升了他以往对史学批评史研究的理论高度。

“总序”是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写作的总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多卷本的写作能否获得成功,就取决于各卷作者对这个总的指导思想的落实程度,就看他们如何把主编的写作意图切实地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以使全书保持统一的问题意识、研究宗旨和写作风格。“总序”在理论上的创新及对全书写作的总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总序”提出史学批评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区别,在写作的侧重点上与各卷作者熟悉的史学史写法区别开来。作者认为,史学批评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的区别在于:1. 具有更为广泛的史料来源;2. 是考察认识史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根据;3. 促进史学概念内涵的深化和理论的生成、发展。由于各卷作者以往的学术经历都侧重于史学史的研究,这二者的区别,对各卷撰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要求各位作者注意史学批评史研究的特殊角度。

“总序”提出在史学批评史写作中应关注的主要问题:1. 史学批评作为一种史学现象,它产生的原因何在;2. 怎样看待和分析史学批评主体提出问题的主要根源;3. 怎样看待史学批评的成果及其思想的社会意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4. 怎样看待史学批评中出现的偏颇。这四个问题,是各卷都需要关注的共性问题,是史学批评史研究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如果各卷作者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各卷在对史学批评史研究的主线的把握上,就会有一个统一的逻辑线索,而使全

^①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书构成完整的有机统一体。

“总序”提出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方法论,给各卷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提醒和指导。这些方法是:第一,把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和所研究的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法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对任何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第二,借鉴古人提出来的有益的思想方法,如章学诚关于知人论世的思想和方法;第三,针对复杂的史学批评现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序”还提出把“探索学科话语体系”作为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以提升研究的理论层次。

这篇“总序”既是关于史学批评史研究的一项创新性成果,又对史学批评史的学术属性、研究对象、资料范围、问题侧重、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及要提升的理论层次,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为各卷作者的具体研究指明了方向。只要各卷作者能够领会其意图并认真落实,那么,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学术专著属性就将得到保障。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各卷较好地完成了“总序”提出的各项要求,如“总序”提出史学批评史研究要促进史学概念内涵的深化,就在具体的各卷中得到落实。譬如关于“良史”这个古代史学思想范畴,各卷作者都深入发掘它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发展。第一卷中谈到的“良史”,其内涵是能够做到“书法不隐”的史家或学识渊博的史家,是对史家主体的评价。第二卷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就探讨了“良史”概念的深化和发展,该时期对“良史”的理解,“除了要求史家具备像董狐一样直书的作史态度、如实撰写史事,还要求史家能够在史料剪裁和结构安排上处理妥当;另外,议论和文辞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①第三卷作者认为,隋唐时期“良史”概念的内涵又有了丰富和发展。“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史学上的‘良史’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即称职的或杰出的史官、史家;二是指书,即那些规范的、严肃的或优秀的历史著作;三是指人们的志向或追求的目标。”相应的提法是“良史之才”“良史之体”“良史之志”。^②第四卷写五代两宋时期,作者写道“曾巩对‘良史’的概念提出了批评性的理论总结,主张从‘理’‘用’‘意’‘情’四个范畴进行归纳与总结,并提出了‘明’‘道’‘智’‘文’的标准与原则。曾巩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③几卷书对一个概念不同时期的内涵、意蕴持之以恒地发掘,深化了古代史学概念研究,完成了“总序”提出的任务。

“总序”中提出把“探索学科话语体系”作为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各卷也都把这个问题放到重要的地位,对史学批评史上提出的概念范畴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如第五卷中就单独设立一章“史学批评观念的阐释”,集中研究该时期比较重要的史学批评概念采撰、事实、史例、史法、史意、良史等。其他各卷也重视对概念范畴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多在本卷的“结语”中予以总结。

通览全书,可以清晰地看到,“总序”提出的各项编纂要求在具体的研究中得到了落实和体现,使全书有了一个清晰的统一的思想逻辑,无论在体例设置还是在问题意识、研究重点、思想风格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给多卷本的集体著作,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这就使多卷本的合作成果,切切实实获得了学术专著之属性,并具有了开拓性、理论性、贯通性的学术色彩。

①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2卷,第345页。

②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3卷,第203—213页。

③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4卷,第421页。

二、几项重要的学术创新

二十多年前,瞿林东就已经开辟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为这部多卷本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问世做了开创性奠基性工作,所以,现在的这部书要在学术思想或重大的学术观点上实现创新,很是不易。但是,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还是取得了不少新的收获。

(一) 关于民族史学批评史的开拓

在新中国以来的学术史上,民族史研究有丰硕的成果,但民族史学的研究颇为薄弱,民族史学批评史则几乎没有触及。这次多卷本的写作,把辽夏金元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探讨其史学批评的发展状况,是一个新的创获。

从该卷的结构安排来看,作者对辽夏金元时期的史学批评做了充分展开性的研究,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瞿林东1994年对史学批评史的初步探讨,并不涉及少数民族史学批评问题,这是他们在规划多卷本的课题时提出来的新设想。少数民族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资料范围如何拓展、研究价值如何评估、辽夏金元时期史学与该时期少数民族史学的界限与把握,等等,都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该卷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同时也预示着是初步的,但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出了初步的有价值的结论。作者写道:

纵观辽夏金元时期的史学批评史,其史学批评成果尽管不能与宋代和明清时期相颉颃,实际上其时具有史学批评内涵的言论、论著为数也不算少,只是由于各族批评者史学素养参差不齐,其批评见解精粗相杂,具有多层次性……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广泛开展,各族批评者就史学问题进行的沟通和交流,影响所及还体现在文化政策上及社会文明建设上……辽夏金元时期的史学批评在政治统治和社会文明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这个研究,第一次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史学批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是该问题研究的奠基之作。

(二)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该书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通史著作,所以,无论是发凡起例,还是历史分期,都是第一次面对,需要作者有开创性的贡献。该书“总序”提出并论证了关于史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 第一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
- 第二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 第三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隋唐时期);
- 第四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兴盛(五代两宋时期);
- 第五阶段:中国古代多民族史学发展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
- 第六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拓展(明时期);

^①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5卷,第305页。

第七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清时期)。

这种分期,把史学批评史分为开端、初步发展、深入发展、兴盛、多民族史学发展、拓展、集大成等七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方面,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

在此之前,关于古代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谓五花八门,众说纷纭,他们没有墨守成说,甚至也没有墨守自己的学术师承,而是面对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批评史的实际历史状况,重新作出判断。之前,白寿彝曾将古代史学史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①瞿林东在其《中国史学史纲》中的划分是:史学的兴起——先秦史学;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史学;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史学;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代后期史学。

按照一般思维,史学批评史属于史学思想史、史学史的范畴;史学思想与史学批评的发展,与史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有了史学就会有对这门学问的思考,有对它不同的看法与反思,史学批评史的分期与史学史的分期统一起来,不会出大的差谬。但作者没有墨守成说,而是重新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分期范例。新的分期把先秦秦汉划为一个时期,辽夏金元独立为一个时期;特别是后者可谓特色鲜明,第一次把西夏史学纳入考察范围,更加强化了该时期多民族史学的时代特色。该书的学术断代可备一说,富有启发意义。

(三)对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总结

在“总序”中,瞿林东把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概念和范畴、构造史学理论的中国话语系统,作为该书研究的重要任务。他自己总结的不同时期的史学批评概念和观念如下:

良史、书法不隐和史书三要素论(事、文、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论,以及立典五志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

素心、信史、烦省、评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及由立典五志论演变而来的书契五善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和注史四旨论(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

直书、曲笔、鉴识、探赜、疑古、惑经,以及史学功用论,史才三长论(才、学、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论,史官辨职论,编年纪传论,师古与随时(稽古与随时)论,形状不实论;

公正,议论,记注,疏谬,不实,非才,法世,会通,以及信史论,史学源起论,良史“四足”论(明、道、智、文),纪事本末论,史法论,作史三原则论(事实、褒贬、文采);

“史笔天下之大信”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论,“事”与“道”关系论,文献论,“理”(义理、事理、文理)“情”(人情)评判标准论,“心术”为修史之本论;

“人恣”与“蔽真”、“人臆”与“失真”、“人谗”与“溢真”,史权,平心,公议,公实,笔正,历史评价无是非论,“经史一物”论,“六经皆史”论、评史著四旨论(据、实、慎、忠),史家修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

养五要素论(才、学、识、公心、直笔)，“务成曩美，毋薄前修”论；

史德、史释、释通、通史家风、别识心裁、记注与撰述、史法与史意、尊史，以及“于序事中寓论断”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论。^①

“总序”中梳理出来的这些观念和范畴，在各卷的相关章节中，都有具体甚至详尽的阐发。如第三卷关于“良史”的讨论，第四卷关于“会通之义”的阐发，第七卷关于“史意”的讨论。第七卷的作者关于史意阐发说：“‘史意’是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章学诚多次援引《孟子》关于事、文、义的论述，且最看重义(意)，所谓‘立言之士，以意为宗’。为此，章学诚用了很多笔墨来阐述义(意)是史学的灵魂这一主张……‘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史学批评也‘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缺少了义(意)的史书，犹如丢失了魂魄之人，唯有别具‘史意’的史书才能传之久远。”^②无疑，该书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概念、范畴的研究，既是拉网式的全面搜罗，又有对具体概念内涵的深入发掘，而且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的工作。

根据该书的研究，笔者去其重复，删去文注，大体总结为这样一组概念：

书法不隐，良史，信史，实录，直书，曲笔，心术，史德，史识，史法，史意；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通之义，通史家风，于序事中寓论断；
史书三要素，立典五志，史著四旨，作史三原则，“务成曩美，毋薄前修”；
史才三长，良史“四足”，史家修养五要素，等等。

这些或者用于对史家的评价，或者用于对史书的鉴识，或者适合于对一般史学现象的评断，或者可作为史学批评的价值标准，构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本土话语系统。这是该书对构建中国史学史学科话语体系的一大贡献。

(四) 关于“史学批评”内涵的发掘，对中国学术史研究意义重大

虽然早在二十多年前瞿林东就已经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这个研究领域，但他一直没有回答为什么要用“批评”之名，来探讨这个实际上与传统所说的“史学评论”并没有本质区别的研究对象。其实，无论从词性还是从概念的基本含义上说，批评当然也是评论，二者之间严格的逻辑区别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批评”与“评论”又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批评”二字总是带有负面评价的意味，就像人们总是把“批判”理解为否定或“斗争”一样。至于为什么在研究实际的史学评论问题时，选取“批评”而不用“评论”，瞿林东在“总序”中第一次作出回答，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富有启发意义。

瞿林东在“总序”中首先说明“本书题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而未以‘评论史’命名，也是意在突出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视角。”接着，他认真考察、梳理古代学人在评点历史人物或论著时使用“评论”“批评”的具体语言环境，洞察其细微区别，最后得出结论说：

^① 参见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总序”，第9、10、11、12—13、15、17、19页。

^②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7卷，第305—306页。

大约在1700年前,中国学人已将“评论”和“批评”的概念置于不同学术领域之中,以此表述和阐说各自的学术见解,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表现。这种现象在元明以后显得更加广泛。由于前人在使用“评论”和“批评”一词时,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解释,故难以从实质上划清二者的界限。但中国学人有重视字义和慎于遣词造句的传统,由此仍可略知“评论”和“批评”的一点区别。“评论”是评量和议论,意在在对事物作出适当的评价;“批评”则兼有批点和评论之意,即既包含正面评价也包含负面评价的双重目标,因而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从学术的观点来看,“评论”多用于泛指,“批评”则与学术讨论的关系更为密切。^①

作者把“批评”的基本内涵最终定位于“反思”二字。批评“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这一发现把“批评”定位于“反思”,从“批评—反思”的视角写学术史,对于书写中国学术史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强大的经学传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批判意识,而学术的本质在于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学术的生机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讲他的辩证法说“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这对于我们理解学术的本质具有启发意义。

对于批判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学术来说,尽可能充分发掘其思想批判的文化要素,是一项积极的学术事业。而从“批评史”的角度去书写学术史,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一目标,就可以做出积极的学术建树。不仅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应该这样做,其他学术史研究也应该这样做。无疑,瞿林东开辟的从反思的角度书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路径,对其他传统学术史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三、开拓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广阔视域

是书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第一部通史,作者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问题,开辟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广阔天地。以下我们来讨论几个由该书引发的学术话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分期。

本书第一次划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提出七阶段说,这里有两个问题可以讨论。其一,本书把先秦秦汉看做一个历史阶段,命之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有讨论的余地。从历史本体看,先秦和两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史学史的情况看,多数学者将其分为两个时期,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也认为其是“兴起”和“创立”两个阶段,本书第一卷的“前言”中也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的兴起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源头所在。”“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既然如此,为什么史学批评史的分期不与之保持一致呢?

作者可能是感到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资料少而不足以成书。但资料的多寡,不能影响到性质的判断。其实,就该书第一卷利用的资料情况看,似还有挖掘的余地。先秦典籍不下二三十种,第一卷利用的不到十种,连包含最早学术史专篇的《庄子·天下》篇都没有涉及,进一步挖掘的余地肯定是有的。在已经利用的典籍中,也有挖掘的余地,如《左传》保留有不少人物评价的资料,是可以纳入批评史讨论范畴的。“总序”中谈史学批评史与一般史学史之区别,第一点就是“具

^①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总序”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有更为广泛的史料来源。这是因为,史学批评不仅十分关注史家群体的史学观点,而且对于非史家群体之史学观点也十分关注,展示出比一般史学史研究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史料来源”。笔者赞成这一说法,要扩大史料来源,放开眼界,不要被一个简单的“史”字束缚。先秦时期,学术没有分化,所有典籍都可以当做史书来看待,所有诸子之论,包括所谓的六经,实际上也都可以纳入史学批评史的资料范围,以丰富我们的研究。

关于两汉时期的资料,利用得也很有限,甚至陆贾、贾谊、董仲舒这样重要的思想家都没有提到,作者给自己设定了太大的局限。像陆贾的《新语》所谈“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①对书的评价,不以人为限,不以孔门著述为标准,而以其是否合乎实际、能否指导实践为标准,这么深刻的见解,是不是应该看作史学批评的宝贵思想呢?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放开眼界,打开思路,深耕细耘,先秦与秦汉各自立卷应该有其可能性。

其二,关于史学批评史不同历史阶段学术特征的抽象,也有讨论的余地。如何抽象或概括一个历史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本书用开端、初步发展、深入、兴盛、拓展、集大成等术语,来概括不同阶段的特征,提供的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表征的只是一种样态,而不具有确切的思想内涵。另外一种,也是较多被采用的,是对一个时期的学术特征进行理论概括。如仓修良把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②瞿林东也曾这样划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阶段:1.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2.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3.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4.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③关于史学批评史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能不能也采用概念抽象的方式来做表述呢?

总之,这部多卷本的史学批评史著作,提出了如何划分发展阶段,以及如何概括不同历史阶段学术特征的问题,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第二个问题,关于史学批评史与经学史的关系问题。

就中国古代学术的特殊性而言,一般学术史和经学史的关系,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学术,就其规模和传承说,最突出的是史学、文学和经学。就其发生学上的意义说,史学的传统最为久远且具有为一切学术奠基的性质,最早的文献典籍都是历史记载。然而,秦汉以后学术分化形成不同的学术门类之后,历史学的重要性,则让位于经学,并逐渐变成被经学支配的学术。史学与经学的关系,就像文学的“文以载道”一样,成为经学的附庸。刘家和曾谈到古代史学与经学的关系,判断儒家经典是史学研究或史书编纂的指导思想。他说:

杰出史学家刘知幾尽管曾在《疑古》、《惑经》诸篇中对儒家经典有所致疑,但是他又曾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史通·序例》)“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

① 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② 仓修良《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③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传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史通·称谓》)刘知幾强调例和名的重要性,就是坚持在史书中贯彻儒家经典的指导思想。当然,这对于封建时代史学家刘知幾来说是不足为奇的,而且以后的封建史家几乎莫不如此。^①

笔者认同这一看法,特别是在宋代理学之后,经学的春秋笔法几乎完全左右了史书的编纂。史学与经学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史学批评史与经学史的关系如何呢?思维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批评的立足点都是史家主体的世界观、历史观,而这些被古人目为“道”的东西,是史家主体进行任何历史评说的指导思想、原则或依据,它们从何而来?荀子早已阐明了这个道理:“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②历史学家评点历史、史家、史书的指导思想,就出自圣人留下的《六经》,故而史学批评史与经学史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经学是发展的,是以有经学史;史学和史学批评也是发展的,它们的发展史就和经学的发展史有着大体平行演进的关系。宋代理学产生之后的经史关系,不同于汉代的经史关系,也是不言自明的。但不管不同时期经史关系的具体内涵如何变化,史学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史学批评史与经学史的密切相连,自汉代由于独尊儒术而形成之后,基本是不变的。

有鉴于此,在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中,着力探讨它和经学史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史学批评史与经学史的关系,应该作为史学批评研究的主要线索之一。在多卷本史学批评史各卷中,应设立专章给予必要的关注。这是笔者在思考史学批评的指导思想问题时的一点收获,也是对这部多卷本著作的一点建议。

第三个问题,对于不同时期史家主体所依循的史学批评原则或标准,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关于古代史家史学批评思想的挖掘,是“总序”提出的史学批评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在史学批评思想范畴中,最重要的思想要素,大概应该是史学批评的标准问题。史家主体如何进行史学批评,他要遵循什么原则,可能不是每个史家都有清晰的认识,但无论如何,他的批评都一定被某种原则所支配。或者是明确的,或者是潜移默化的,批评的标准一定是有的。致力于古代史家史学批评标准的探讨,可以给今天的史学批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从史学史的实际出发,古人是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的,他们很少直言自己的价值标准,但标准意识却分散地深埋在他们大量而零星的思想资料中,需要我们去爬梳整理,精心提炼。章学诚《史德》篇说: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③

这里的“尽其天而不益于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批评标准。一切历史著述,都应该尽可能真实地反

① 刘家和《史学和经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映历史的客观面貌,而不过多倾注重史者的主观偏见,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判断史书质量的基本标尺。拿史书反映历史客观性的状况作为标准,不仅在古代,即使在今天,也是需要坚持的史学批评标准。挖掘这些史学批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第四卷谈到吴缜的修史三原则“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以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①用事实、褒贬、文采作为衡量史书的优劣,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标准。

陆贾所言“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②用著者思想的实践效果,用史书的实际鉴戒价值作为评价尺度,自然也可以视为一种价值标准。

本书第六卷提到了史学评价标准问题。作者写道:

自孟子称孔子《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以来,史义已经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核心内容。诚如前文所言,明人对史义的关注贯穿整个有明一代。其中涉及的具体矛盾应当是超越前代的:不作评论,还是予以价值判断?评价时是以圣人为则,还是私填胸臆?圣人传统当遵《春秋》《资治通鉴》,还是《资治通鉴纲目》?编年与纪传孰优孰劣?历史有统绪还是无统绪?哪些政权当归于统绪?……在李贽之前,这些问题似乎各自皆可成辞;但是,李贽批评众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之言一出,有如石破天惊,一切批评随之功亏一篑。这是明代史学批评在评价标准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③

由是言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提炼出来的不少概念和观念,都可以归纳到评价标准的范畴中,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从评价标准的角度去思考阐释它,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概括和提炼。以笔者之见,如果在史学批评史的著本中,加入一个史学批评标准作为研究角度,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研究的理论层次。关于古代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研究,也可以作为史学批评史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范畴。

总之,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项里程碑式建树。它不仅开辟了一个宏阔的研究领域,而且由于主编的学术素养及其学术个性和学术风格的灌注,使得这项出自众人之手的成果,打上了鲜明的个性化印记,在当代学界独树一帜。其间的学术创新性成果,也将激发学术同好的研究兴趣,以共同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开掘。史学批评史研究意义重大,正像瞿林东所说,史学批评是走向理论研究、理论创获之路。^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瞿林东开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以及它的示范效应,将为中国史学的理论提升带来新的契机。

(作者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邮编:475001)

(责任编辑:杨艳秋)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吴缜《新唐书纠缪序》,《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9页。

② 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③ 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6卷,第439页。

④ 瞿林东《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